

《史记》“重言”现象解析

田 蔚

《史记》的“重言”话语多以“某某曰”为标记,借助它们的存在使得文意扩大而深入。《史记》的“重言”以“层间叠发”的形式出现,构成了文本内部的对话效果,是作者植入生命激情的显现。其与“太史公曰”互补共用,表现出司马迁欲将自己与先贤并列的自我期许。尚善、用情和借言行事是太史公“重言”的用心所在,也是整部《史记》突出的叙事重点。本文拟借用《庄子》“重言”一词对《史记》“某某曰”的言说方式进行探索、解读,以期领略《史记》文本的语言艺术及其深意所在。

披阅《史记》,人们常常关注以“太史公曰”为标记的话语方式,这种论赞形式成为后代史书和小说的评论范例,学界对此已有充分的研究。而《史记》中时常出现以“某某曰”为标记的引用性话语,诸如“孔子曰”、“老子称”、“《易》曰”、“韩子曰”、“贾子曰”等,对这种言说方式的系统探究,目前还付之阙如,有必要加以探讨。

一、《史记》“重言”之话语呈现

何为“重言”?“重言”之“重”究竟读“chóng”,还是读“zhòng”?对此历来众说纷纭。在庄子那里,“重言”可以是重复之“重”,因为“道不外求”,体道、言道、释道,无不有重复的味道,但后代注家多认为“重言”是借重之“重”,引用他人话语以证己意。《庄子·寓言》“重言十七”,晋郭象注云:“世之所重,则十言而七见信。”唐成玄英疏云:“重言,长老乡闾尊重者也。老人之言,犹十信其七也。”^①宋林希逸云:“重言者,借古人之名以自重,如黄帝、神农、孔子是也。”^②今人陈鼓应则云:“借重先哲时贤的言论占了十分之七。”^③笔者所遵从者,即“重言”是借重古来尊者之言的说法。当我们将“重言”界定为征引、援用圣人时贤话语的言说方式时,《史记》中就会有诸多行于文本之内的“重言”话语浮出水面。这些话语的征引对象以先秦诸子和典籍为主,

主要包括孔子、老子、《周易》以及庄子、孟子、墨子、韩非子、贾谊等人的话语。兹从以下几个方面分别论述。

(一)《史记》“重言”首以引孔子之言为主,其言大多出自《论语》。有学者认为“近三分之一的《论语》内容被司马迁写入《史记》之中”^④。的确,《史记》“重言”有对《论语》“子曰”的直接引用,如《宋微子世家》中记太史公曰:“孔子称‘微子去之,箕子为之奴,比干谏而死,殷有三仁焉’。”^⑤《管晏列传》:“方晏子伏庄公尸哭之,成礼然后去,岂所谓‘见义不为无勇’者邪?”^⑥《万石张叔列传》中记太史公曰:“仲尼有言曰‘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’,其万石、建陵、张叔之谓邪?”^⑦《李将军列传》中记太史公曰:“传曰‘其身正,不令而行;其身不正,虽令不从’。其李将军之谓也?”^⑧这些皆属于引用性话语。

《史记》有些“重言”是将《论语》多句合并为一句,对孔子之言进行化裁拼合。如《孝文本纪》中记太史公曰:“孔子言‘必世然后仁。善人之治国百年,亦可以胜残去杀’。诚哉是言!”^⑨所节引者分别见于《论语·子路》中两处:“子曰:‘善人为邦百年,亦可以胜残去杀矣。’诚哉是言也!”^⑩“子曰:‘如有王者,必世而后仁。’”^⑪司马迁合并孔子“王者”和“善人”之论于一处,以之作为对汉孝文帝治国四十余年“德至盛”的褒扬。又如《伯夷列传》:“或择地而蹈之,时然后出言,行不由径,非公正不发愤,而遇祸灾者,不可胜数也。”^⑫其中“时然后出言,行不由径”分别取自《论语·宪问》与《论语·雍也》两处:“子问公叔文子于公明贾曰:‘信乎,夫子不言,不笑,不取乎?’公明贾对曰:‘以告者过也。夫子时然后言,人不厌其言;乐然后笑,人不厌其笑;义然后取,人不厌其取。’子曰:‘其然?岂其然乎?’”^⑬“子游为武城宰。子曰:‘女得人焉耳乎?’曰:‘有澹台灭明者,行不由径,非公事,未尝至于偃之室也。’”^⑭《论语》衡量君子言行的话语被司马迁弥合于《伯夷列传》的文本中,妥帖自然。《史记》中还有套用孔子言语的征引方式。如《鲁周公世家》中记太史公曰:“余闻孔子称曰‘甚矣鲁道之衰也!洙泗之间断断如也’。”^⑮这样的句式显然模仿《论语·述而》“甚矣吾衰也!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”^⑯的感叹。孔子感伤自己复兴周礼、行周公之道的理想随老之将至而不能实现,《史记》巧妙套用,表达的则是作者对作为周公封国的鲁国礼崩乐坏的叹惋之情。

司马迁有时借助这种“重言”方式,将文本语意引向更深沉的境界。如《伯夷列传》中称引孔子之言:“伯夷、叔齐,不念旧恶,怨是用希。”“求仁得仁,又何怨乎?”^⑰意指孔子认为伯夷、叔齐遵从父命和礼让的逊位是心甘情愿、丝毫无怨的,而司马迁又在这一个“怨”字上做文章:“余悲伯夷之意,睹轶诗可异焉。”^⑱从而引出伯夷、叔齐《采薇歌》中对武王“以暴易暴兮,不知其非矣”^⑲的批评,于是自然产生了“由此观之,怨邪非邪”^⑳的怀疑,进而对“天道无亲、常与善人”^㉑提出质问,一吐自己如鲠在喉的牢骚,寓写内心的不平和愤懑。作者借孔子之言使思考走向深入,整篇文意的转捩点即在于此。

(二)《史记》“重言”的又一话语表现为引用《周易》、《诗》、《书》等六艺言辞作为评论的依据。《易》学博大精深,诚如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所言:“《易》道广大,无所不包,旁及天文、地理、乐律、兵法、韵学、算术,以逮方外之炉火,皆可援《易》以为说。”^㉒《易》学与《史记》的密切联系,学者多有深刻论述,诸如司马迁发愤著书与《易·乾·象》“天行健,君子以自强不息”^㉓的奋发精神相通,《史记》以《易·系辞下》“天下同归而殊涂,一致而百虑”^㉔的理念整合学术思想;《史记》“通古今之变”的观念与《易》“穷则变,变则通,通则久”^㉕相连等等。司马迁在《太史公自序》中已明言《史记》的撰写是为了“正《易》传,继《春秋》,本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”^㉖,因而作者对《周易》话语的引用也比比皆是。直接引用如《太史公自序》:“故《易》曰‘失之毫厘,差以千里’。”^㉗《伯夷列传》:“同明相照,同类相求。”“云从龙,风从虎,圣人作而万物睹。”^㉘后者源于

《易·乾·文言》：“同声相应，同气相求。水流湿，火就燥，云从龙，风从虎，圣人作而万物睹。”^②又如《屈原贾生列传》对屈原《离骚》的评论：“其文约，其辞微，其志洁，其行廉，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，举类迥而见义远。”^③源于《易·系辞下》：“其称名也小，其取类也大。其旨远，其辞文，其言曲而中。其事肆而隐。”^④《天官书》：“仰则观象于天，俯则法类于地。”^⑤源于《易·系辞下》：“仰则观象于天，俯则观法于地。”^⑥《楚元王世家》记太史公曰：“国之将兴，必有祯祥，君子用而小人退。国之将亡，贤人隐，乱臣贵。”^⑦源于《易·泰》：“内君子而外小人。君子道长，小人道消也。”^⑧诸如此类，不一而足。

《史记》中对《诗》、《书》等经典文本语句的引用也比较常见，如《孔子世家》记太史公曰：“《诗》有之：‘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。’虽不能至，然心乡往之。”^⑨表达对孔子无限的仰慕之情。《张释之冯唐列传》引用《尚书》称誉张释之与冯唐：“《书》曰：‘不偏不党，王道荡荡；不党不偏，王道便便。’张季、冯公近之矣。”^⑩

(三)《史记》“重言”中还包括对老子、庄子等诸子话语的引用，有正面引用作为例证的，如《酷吏列传》：“老氏称：‘上德不德，是以有德；下德不失德，是以无德。法令滋章，盗贼多有。’”^⑪《刘敬叔孙通列传》：“‘大直若诎，道固委蛇’，盖谓是乎？”^⑫《范睢蔡泽列传》：“吾闻‘欲而不知足，失其所以欲；有而不知止，失其所以有’。”^⑬“太史公曰：韩子称‘长袖善舞，多钱善贾’，信哉是言也！”^⑭《游侠列传》：“韩子曰：‘儒以文乱法，而侠以武犯禁。’二者皆讥，而学士多称于世云。”^⑮也有故意正说，实际上却表示厌恶和困惑的，如《游侠列传》：“由此观之，‘窃钩者诛，窃国者侯，侯之门仁义存’，非虚言也。”^⑯其言语本《庄子·胠篋》：“彼窃钩者诛，窃国者为诸侯，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，则是非窃仁义圣知邪？”^⑰这类引用明显表现了作者的愤激之情。《扁鹊仓公列传》：“故老子曰‘美好者不祥之器’，岂谓扁鹊等邪？”^⑱语本《老子》：“夫佳兵者，不祥之器，物或恶之，故有道不处。”^⑲扁鹊以精湛医术救人，反遭小人嫉恨以致惨遭不幸，司马迁换用《老子》中之“佳兵者”为“美好者”，美好的医术与“非君子之器”的“兵”的同类比附，反映出作者对当时社会人心的深深困惑。

二、《史记》“重言”的特色

《史记》“重言”的存在无疑增加了《史记》作为历史文本在内容材料上的丰富性，这自然与《太史公自序》所谓“百年之间，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”^⑳有关。司马迁博览“史记石室金匱之书”^㉑，凭借恣肆之才情驱遣“重言”话语行于文中。《史记》大量使用“重言”之源头，可追溯到《尚书》、《左传》。《尚书》中有“我闻曰”六处、“古人有言曰”四处，这与它本身是王者的训誓诰命等文体有关。《左传》中以“君子曰”、“君子谓”、“君子以为”等形式表达的评论大量存在，据逮耀东统计，以“君子”的形式道出的有八十四条^㉒。《左传》的“君子曰”往往以人事行为是否合于“礼”为标准，“君子曰”附于事后具有“卒章显其志”的道德评判色彩。如《隐公十一年·郑庄公戒饬守臣》的“君子曰”，认为郑庄公对于许国：“无刑而罚之，服而舍之，度德而处之，量力而行之。相时而动，无累后人，可谓知礼矣。”^㉓《左传》的“君子曰”更多的是辅助完成了以传解经的功能，而司马迁所征引的“重言”相较《左传》中的“君子曰”则有很多的不同：出现的位置更加自由，篇首、篇尾、事前、事后均可，如前所述，征引的范围也非常广泛。尽管《史记》的“重言”同样具有彰显道德、隆盛礼义的色彩，但不惟道德评判马首是瞻，而是令话语与前后文本交融结合，将思想置于更加高远深邃的历史空间。

质言之，《史记》“重言”话语存在的最大特色就是以“层间叠发”的样态出场。“层间叠发”

一词出自清吴见思对《史记·伯夷列传》的评点：“妙处在杂引经传，层间叠发，而神理自成一片，纵横变化，绝不费手，非史公其孰能之？”^⑤这里的“杂引经传，层间叠发”就包括援引孔子等圣贤言语以证己意的“重言”，其评议堪称一语中的，准确指明了《伯夷列传》中存在着“重言”叠加现象。其实，《史记》其他篇目如《游侠列传》、《酷吏列传》、《货殖列传》亦是如此。此外，如果将《战国策·秦策三》中“蔡泽见逐于赵”与《史记·范雎蔡泽列传》一传互读，就会发现《范雎蔡泽列传》在“蔡泽劝说范雎应功成身退”时基本沿用了《战国策》的表述，但明显的不同之处是司马迁在“圣人之道也”的后面，一口气连续加入了《论语》、《周易》爻辞等“重言”话语：“故‘国有道则仕，国无道则隐’。圣人曰‘飞龙在天，利见大人’。‘不义而富且贵，于我如浮云’。”^⑥重言密集，可见一斑。这里将《战国策》与《史记》的相关部分对比如下：

“今君相秦，计不下席，谋不出廊庙，坐制诸侯，利施三川，以实宜阳，决羊肠之险，塞太行之口，又斩范、中行之途，栈道千里于蜀、汉，使天下皆畏秦。秦之欲得矣，君之功极矣。此亦秦之分功之时也！如是不退，则商君、白公、吴起、大夫种是也。君何不以此时归相印，让贤者授之，必有伯夷之廉，长为应侯，世世称孤，而有乔、松之寿。孰与以祸终哉！此则君何居焉？”应侯曰：“善。”乃延入坐为上客。^⑦

“今君相秦，计不下席，谋不出廊庙，坐制诸侯，利施三川，以实宜阳，决羊肠之险，塞太行之道，又斩范、中行之途，六国不得合从，栈道千里，通于蜀汉，使天下皆畏秦，秦之欲得矣，君之功极矣，此亦秦之分功之时也。如是而不退，则商君、白公、吴起、大夫种是也。吾闻之，‘鉴于水者见面之容，鉴于人者知吉与凶’。书曰‘成功之下，不可久处’。四子之祸，君何居焉？君何不以此时归相印，让贤者而授之，退而岩居川观，必有伯夷之廉，长为应侯。世世称孤，而有许由、延陵季子之让，乔松之寿，孰与以祸终哉？即君何居焉？忍不能自离，疑不能自决，必有四子之祸矣。易曰‘亢龙有悔’，此言上而不能下，信而不能诎，往而不能自返者也。愿君孰计之！”应侯曰：“善。吾闻‘欲而不知足，失其所以欲；有而不知止，失其所以有’。先生幸教，雎敬受命。”于是乃延入坐，为上客（划线为笔者所加）。^⑧

两相对比，《范雎蔡泽列传》引用了《墨子·非攻》中的墨子之言：“古者有语曰：‘君子不镜于水，而镜于人。镜于水见面之容，镜于人则知吉与凶’。”^⑨又引用了《周易》、《老子·俭欲》中的文字，这些都是《战国策》文本中所没有的。《战国策》中充满着纵横家诡谋之策、奇谲之辞，大有惟利是图的倾向，而在司马迁看来，战国士人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已经和老子、孔子的时代大不一样，尔虞我诈日渐突出。因此，司马迁在对战国文本原封不动挪用的同时，必须要在密集得令人压抑的说词中见缝插针地塞进去自己挑选的“重言”，这些“重言”的存在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“补救”了缺少“善言”的战国文本，或者说是给战国文本以道德寄托。对于《史记》和《战国策》的前后取材关系，学者有以班固为代表的所谓《史记》采《战国策》之说^⑩，也有以桐城派吴汝纶等为代表的说法，即因《战国策》中有九十多处同于《史记》叙事，故而认为后人取《太史公书》移入《战国策》之说^⑪。但无论是哪种观点，都能见出这些“重言”话语在《史记》中高频率的存在，这在其后的历史文本中并不多见。

“重言”在《史记》文本内部还往往产生一种“对话”效果。巴赫金的对话理论认为，当我们谈论某一话题时，在前人那里已经形成了观点和看法的“稠密地带”，“在话语和所讲对象之

间,在话语和讲话个人之间,有一个常常难以穿越的稠密地带,那里是别人就同一对象而发的话语,是他人就同一题目而谈的话”^③。具体在《史记》的写作过程中,司马迁必须得穿越这一话语形成的“稠密地带”,以自身的话语作为与谈述对象沟通的桥梁,方能达到与外部世界的交流。《史记·孟子荀卿列传》篇首有言:

太史公曰:余读孟子书,至梁惠王问“何以利吾国”,未尝不废书而叹也。曰:嗟乎!利诚乱之始也!夫子罕言利者,常防其原也。故曰“放于利而行,多怨”。自天子至于庶人,好利之弊何以异哉!^④

此篇以“太史公曰”发端,将孟子对梁惠王重义轻利的回答追溯到孔子“罕言利”的思想,表达了“利诚乱之始”,“自天子至于庶人,好利之弊何以异哉”的感慨。司马迁的话是在孔子、孟子言语之外自我观点的表达,不啻作者与前贤在几百年后的一次“对话”。引用“重言”而构成的对话效果还表现在《酷吏列传》、《游侠列传》等篇中。如《酷吏列传》的开篇:

孔子曰:“导之以政,齐之以刑,民免而无耻。导之以德,齐之以礼,有耻且格。”老氏称:“上德不德,是以有德;下德不失德,是以无德。法令滋章,盗贼多有。”太史公曰:“信哉是言也!法令者治之具,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。昔天下之网尝密矣,然奸伪萌起,其极也,上下相遁,至于不振。当是之时,吏治若救火扬沸,非武健严酷,恶能胜其任而愉快乎!言道德者,溺其职矣。故曰‘听讼,吾犹人也,必也使无讼乎’。‘下士闻道大笑之’。非虚言也。汉兴,破觚而为圜,斫雕而为朴,网漏于吞舟之鱼,而吏治烝烝,不至于奸,黎民艾安。由是观之,在彼不在此。”^⑤

这里的“重言”话语以“孔子曰”起笔,以“老氏称”续接,以“太史公曰”作结,以“故曰”和老子之言为余波,孔子、老子和太史公三人的密集言语此起彼伏,形成了强大的超越时代的对话空间。孔子、老子在礼乐教化百姓的取径上虽有所不同,但在反对酷刑峻法、密网严令方面却殊途同归。因此,司马迁对二人话语的引用也就成为《酷吏列传》一篇的立意之本。又如《伯夷列传》,细究其文本内强大的“重言”话语,对话关系也非常明显。文中有云:“或曰:天道无亲,常与善人。”^⑥在肯定天道存在的同时,作者却又生困惑:伯夷、叔齐饿死首阳,好学颜渊受穷早夭,暴戾恣睢如盗跖者却以寿终,操行不轨者终身逸乐,谨守言行之君子却横遭灾祸,从而对天道产生怀疑和质问:“余甚惑焉,倘所谓天道,是邪非邪?”^⑦于是作者偕“重言”,又开始了一场挟风雨带雷电的“对话”。

《史记》“重言”所带来的对话效果要彻底实现,必定是以“听者”的存在为前提的。我们知道,在一个话语行为中,说话者的发语目的、要达到的意图与听话者(或潜在的)的受话期待及可能给出的应答相关联,说话者的行文和感情也会受其影响。可以说,作者都是在为想象中存在的读者而写作。伊格尔顿认为:“每一个文学文本的构成都出于对其潜在的可能读者的意识,都包含着一个它为其而写者的形象:每一部作品都在自己内部把伊赛尔所谓的‘隐含读者’编入代码,作品的每一种姿态里都含蓄地暗示着它所期待的那种‘接受者’。”^⑧那么,《史记》中诸多的“重言”以及独特的“太史公曰”,是否存在“听者”?如其存在,“听者”又为谁呢?《史记》是对中华民族三千年历史的总结和梳理,统揽古今,学究天人,后世人也就成为《史记》文本的“隐含读者”。在《史记》正文中曾出现了三次“后有君子”的话语,如《封禅书》:“后有君

子,得以览焉。”^④《六国年表》:“后有君子,以览观焉。”^⑤《高祖功臣年表》:“后有君子,欲推而列之,得以览焉。”^⑥在《太史公自序》中,司马迁更进一步说道:“凡百三十篇,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,为《太史公书》……藏之名山,副在京师,俟后世圣人君子。”^⑦后世的所谓“君子”正是司马迁要等待的读者,他将希望寄予未来,期待着与未来的对话!

《史记》中的“重言”并不是简单的“借重”,而是作者“成一家之言”的具体实践。司马迁固然是在借重援引古人话语,固然是在“层间叠发”,形成对话和沟通,但本质上他是在追求创新出奇,其“究天人之际,通古今之变”的根本目的,为的是“成一家之言”。“成一家之言”就是借它山之石以攻玉。如《伯夷列传》中连续借引的孔子之言:“子曰‘道不同不相为谋’,亦各从其志也。故曰:‘富贵如可求,虽执鞭之士,吾亦为之,如不可求,从吾所好。’‘岁寒,然后知松柏之后凋。’举世混浊,清士乃见。岂以其重若彼,其轻若此哉?”^⑧这世间清者自清,浊者自浊,正如清代李桢所言“夫天道与善之说,有时不足深恃,亦守其在我者而已”^⑨。司马迁在此以平静的笔调将史学家的激情转变为哲学家的睿智,列传作结处依然采用“重言”话语:“‘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。’贾子曰:‘贪夫徇财,烈士徇名,夸者死权,众庶冯生。’‘同明相照,同类相求。’‘云从龙,风从虎,圣人作而万物睹。’伯夷、叔齐虽贤,得夫子而名益彰。颜渊虽笃学,附骥尾而行益显。岩穴之士,趣舍有时若此,类名堙灭而不称,悲夫!闾巷之人,欲砥行立名者,非附青云之士,恶能施于后世哉?”^⑩司马迁正是借用“或曰”、“子曰”、“故曰”、“贾子曰”以及《周易》卦辞等他人之言,为自己搭建出思想的梯阶,将不幸遭遇的个案上升为抽象的“好人是否终有好报”的哲学命题,这是司马迁对命运问题的拷问。

司马迁借用“重言”,将前人抽象性、思辨性的话语思想“空言”与各种史实相连,将古代史官的“言”、“事”分记冶为一炉,把“重言”与自己的“一家之言”即“司马子言”有机地结合在一起。如果留意“重言”的话语呈现,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,即一部分“重言”话语是被统合在“太史公曰”之内的,除前文所举各例外,还有如《吴太伯世家》:“太史公曰:孔子言‘太伯可谓至德矣,三以天下让,民无得而称焉’。余读春秋古文,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句吴兄弟也。”^⑪《田叔列传》:“太史公曰:孔子称曰‘居是国必闻其政’,田叔之谓乎!”^⑫《淮南衡山列传》:“太史公曰《诗》之所谓‘戎狄是膺,荆舒是怨’,信哉是言也。”^⑬以《货殖列传》为例,一开篇即引老子之言为整篇列传起笔的原点,把“老子曰”和“太史公曰”并列成段。但老子心中所向往的乌托邦社会,明显与司马迁后文所奋笔直书的情百态相去甚远,“天下熙熙,皆为利来;天下攘攘,皆为利往”,无论是“千乘之王,万家之侯,百室之君”,还是“匹夫编户之民”,无不“耳目欲极声色之好,口欲穷刍豢之味,身安逸乐,而心夸矜势能之荣”^⑭。因而司马迁认为,若一味地以小国寡民的理想来要求现在,不现实也不可能,“必用此为务,挽近世涂民耳目,则几无行矣”^⑮。司马迁在质疑老子言论的当下效用时,却能善用“因其固然”的思想,肯定追求财富是“人之情性,所不学而俱欲者”^⑯;“若水之趋下,日夜无休时”^⑰,并叙写了近世人人为了财的众生相。诚如钱钟书所论:“马迁传货殖,乃为此‘鄙’、‘俗’写真耳。”^⑱班固以“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”^⑲相指责,惜其未察司马迁对世情的洞达、对历史的卓识。“迁据事而不越世,切近而不鹜远”^⑳,老子之言是司马迁对社会经济思索的起点,但司马迁从现世的实际情况出发,破中有立。这种以“太史公曰”囊括圣贤之言的书写行为,绝非其自我表白的“整齐百家杂语”所能包容,“太史公曰”和“重言”在《史记》中形成了互补共用的效果,它们都同时指向“成一家之言”。正如梁启超所说:“其(司马迁)著书最大目的,乃在发表司马氏‘一家之言’,与荀卿著《荀子》,董生著《春秋繁露》,性质正同。不过其‘一家之言’,乃借史的形式以发表耳。故仅以近世史的观念读《史记》,非能知《史记》者也。”^㉑

三、《史记》“重言”的功能

司马迁的“重言”话语方式在《史记》中究竟取得了怎样的语用指向?笔者以为,这样的发问实际上触及到了“重言”在《史记》中的多重功能问题。

(一)司马迁用“重言”显示出史学家尊重古代圣贤价值标准的“尚善”精神。“重言”来源范围之广前已述及,从儒家到法家,从《周易》到老庄,《史记》都能纵横捭阖,出入从容。其“重言”或如疾风暴雨,不可遏止;或如林间小溪,淙淙作响。作者随思之所至,信手拈来前人“伟言”,古来圣贤及其言论的权威性和经典性,在不期然间已悄然树立。“引证文本的本身就是实际的经典化实践,更多地、更权威地、更集中地引述某些文本,这些文本就被经典化了。”^②《史记》于引用孔子之言后,往往有“诚哉是言”、“信哉”等首肯性话语,或者在援引之后以“其……之谓邪”、“岂谓……邪”、“岂……之谓乎”等问句收束。无论何种形式,都说明孔子之言已成为《史记》评判人物之根据。司马迁对孔子等古代圣贤的崇敬就是出于情感上的选择和肯定,并且将自己的使命与继承孔子的文教事业连接在一起。司马迁在《伯夷列传》和《孔子世家》中都引用了孔子“君子疾殁世而名不称焉”之语,近人姚永概认为“史公两引斯语,皆以《史记》本《春秋》也”^③,可见渊源有自。但在学术思想上,司马迁并不受制于哪一家或哪一派,因为只有多方吸纳,披沙拣金方能“成一家之言”。

(二)司马迁的“重言”表现出其“用情”的真诚。《史记》“重言”杂引经传,看似有意纵横驰骋,实为情之不能自己,其征引的力度正是创作主体植入生命激情的显现。以《伯夷列传》而言,真正算得上是伯夷、叔齐本传的只是夹杂在中间的一小段——二百七十四字。司马迁借伯夷、叔齐发出对天道不公的感慨,内心百折千回之情决定了他要以那样密集的“重言”行文。撰史中的司马迁似乎已幻化为传中的伯夷、叔齐,整篇《伯夷列传》几乎成为作者的夫子自道!对此,清代学者方黎如已有所体认:“其自为客主,四五复之。”“‘是耶非耶’以上,皆太史公设为或人难端,所谓‘余’者,代或人自余云尔,其下则史公之折之也。”^④

从《论语》的“子曰”到《左传》的“君子曰”,再到《史记》的“太史公曰”以及“太史公曰”中再套上有形无形的“某某曰”,我们深刻感受到的是司马迁那种急切的立言之情,他不仅要“照着说”,还要借用古来圣贤之说并将其糅合融化进自己的文本之内“接着说”,这种糅合有种喷薄而出、不可压抑的力量。如《屈原贾生列传》,司马迁于叙屈原事迹未了就加入自己的主观论断:“人君无愚智贤不肖,莫不欲求忠以自为,举贤以自佐,然亡国破家相随属,而圣君治国累世而不见者,其所谓忠者不忠,而所谓贤者不贤也。怀王以不知忠臣之分,故内惑于郑袖,外欺于张仪,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、令尹子兰。兵挫地削,亡其六郡,身客死于秦,为天下笑。此不知人之祸也。”^⑤司马迁极度痛心于楚国君昏臣佞的政治黑暗,因而在议论之后又引用《易·井》爻辞取譬:“《易》曰:‘井泄不食,为我心恻,可以汲。王明,并受其福。’王之不明,岂足福哉!”^⑥再次借言抒愤,为屈原的遭遇鸣不平,同时也是其自身遭际的悲愤书写。《易》言辞的引用成为司马迁抒情言志的通道,个体情感由此得到淋漓酣畅的表达。

(三)司马迁的“重言”是借古代圣贤的言论来衡理说事,是其成圣成贤理想的积极实践。司马迁是以圣贤事业为抱负的史家,周公、孔子等古代圣贤是其心仪的榜样和理想的追求。“三不朽”的思想对司马迁影响至深,他遭受腐刑成为“刑余之人”后,深知在其他方面的建树已成非分之想,《报任安书》所谓“隐忍苟活,函粪土之中而不辞”^⑦,就是要“立言”以求“不朽”,以成就他的名山事业。《太史公自序》有云:“我欲载之空言,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。”^⑧司

马迁辟除“空言”,不是否定“空言”,而是讲究饱含实质之言,实质之言便是司马迁所谓的“行事之深切著明”,这样的“言”本身就是“行事”,就是言行一致,就是理性与感性的统一。换言之,司马迁之“言”,实际上已经成为实践。不仅是“重言”,就连说古道今和抒情言志,统统变为借题发挥的一种举措。五十二万余字的《史记》将言、事熔为一炉,觉民济世之思与“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”^②的三千年人事绾结一处,发人深省。

总而言之,在《史记》中,“重言”不再仅仅是一种文本的修辞方法,也不再仅仅是史家的旁征博引,它蕴涵着绵邈的学术思想和丰富的人文情采,包含着卓绝的春秋大义。从这个意义上讲,“成一家之言”的《史记》本身无疑也成为文史长河中永恒之“重言”。

① 郭象注、成玄英疏《南华真经注疏》,中华书局1998年版,第538页。

② 林希逸《庄子鬳斋口义校注》,中华书局1997年版,第431页。

③④ 陈鼓应《庄子今注今译》,中华书局1983年版,第728页,第256页。

④ 陈桐生《不是六艺胜似六艺——谈〈史记〉与〈论语〉的学术关系》,载《孔子研究》2004年第1期。

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
㉟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
《史记》,中华书局1962年版,第1633页,第2136页,第2773页,第2878页,第437页,第2125页,第1548页,第2122页,第2122页,第2123页,第2123页,第2124页,第3296页,第3298页,第2127页,第2482页,第1342页,第1990页,第1947页,第2761页,第3131页,第2726页,第2424页,第2425页,第3181页,第3182页,第2817页,第3319页,第3296页,第2422页,第2423—2424页,第2343页,第3131页,第2124页,第2125页,第1404页,第687页,第878页,第3320页,第2126页,第2127页,第1475页,第2779页,第3098页,第3253页,第3253页,第3271页,第3254页,第2485页,第2485页,第3297页,第3321页。

⑩⑪⑬⑭⑮ 杨伯峻《论语译注》,中华书局1980年版,第137页,第137页,第150页,第59页,第67页。

②② 永瑤等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卷一,海南出版社1999年版,第13页。

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
《十三经注疏·周易正义》,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,第10页,第304页,第300页,第312页,第17页,第298页,第66页。

④⑥ 朱谦之《老子校释》,中华书局1984年版,第123—124页。

④⑨ 逮耀东《抑郁与超越:司马迁与汉武帝时代》,三联书店2008年版,第274页。

⑤⑩ 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,中华书局2009年版,第76页。

⑤① 吴见思《史记论文》,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,第30页。

⑤③ 《战国策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,第216—217页。

⑤⑤ 吴毓江《墨子校注》,中华书局1993年版,第204—205页。

⑤⑥ 《汉书·司马迁传》言:“故司马迁据《左氏》、《国语》,采《世本》、《战国策》,述《楚汉春秋》,接其后事,迄于天汉。”中华书局1962年版,第2737页。

⑤⑦ 吴汝纶《记太史公所录左氏以后》言:“昔者,尝怪子长能窜易《尚书》及《五帝德》、《帝系姓》之文,成一家言,独至《战国策》则一因仍旧文,多至九十余事,何自乖异如是!及细察《国策》中若赵武灵王、平原、春申君、范雎、蔡泽、鲁仲连、苏秦、荆轲诸篇,皆取太史公叙论之语而并载之,而曾子固亦称《崇文总目》有高诱注者仅八篇,乃知刘向所校《战国策》亡久矣,后之人反取《太史公书》充入之,非史公尽取材于《战国策》,决也。”《吴汝纶全集》,黄山书社2002年版,第299页。

⑤⑧ 巴赫金《小说理论》,白春仁等译,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,第55页。

⑥③ 特雷·伊格尔顿《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》,伍晓明译,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,第81页。

⑥⑨⑧④ 杨燕起等编《历代名家评史记》,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,第547页,第548页,第543—544页。

⑦⑧⑩ 钱钟书《管锥编》,中华书局1986年版,第1册第382页,第383页。

⑦⑨⑩ 《汉书》,中华书局1962年版,第2738页,第2733页。

⑧① 《梁启超全集》第十六卷《要籍解題及其读法》,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,第4628页。

⑧② 陈来《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——春秋时代的宗教、伦理与社会思想》,三联书店2002年版,第173页。

(作者单位 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、暨南大学华文学院)

责任编辑 山木